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今年5月，已有超過三十萬人次閱讀本刊網頁（www.cuhk.edu.hk/ics/21c），令編輯室同仁深感欣慰。鑒於本刊來稿數量大增、質量不斷提高，編輯室從去年4月起在本刊網頁上開設網絡版月刊，它也包括部分印刷版文章。今年，遵照大多數刊物的做法，本刊印刷版文章不再即時上網。我們希望那些過去由本刊網頁閱讀《二十一世紀》的熱心讀者，可以通過我們的代理機構（見頁162、163廣告）訂閱本刊。另一方面，我們也將逐步改進本刊網頁，特別是「網上三邊互動」，使編者、作者和讀者之間及時互動起來。請各地讀者積極參與、支持我們。

——編者

何謂「大歷史」、「小歷史」和「西方」、「本土」之分野？

貴刊今年4月號易辰的〈田野研究與本土學術〉一文，是討論兩部村莊政治研究的重要著述，也涉及到某些論者提出的「小歷史」與「大歷史」和「本

土」與「西方」的分野。但筆者對其中某些論述不敢苟同。

第一，微觀實證研究的内容通常被研究者加以時空的限制。每個微觀實證研究的成果都是一種「小歷史」的展現。但如果研究者不能詳細地闡明其選題的背景和意義，不能總結與歸納出這個個案與其他相類事物的共性與個性特徵，其研究成果就不能算是上乘。如果他能夠做到上述各點，就無所謂「小歷史」與「大歷史」的分野。

第二，思想與學術是沒有國界的。每一部成功的著述都會建立起一種新的範式，但「典範」是不可以簡單重複的。「典範」的意義主要體現在它們所創立的那些新的研究範疇，以及相應的發掘與整理研究材料的方法。衡量一項研究成果水平高低的一個永恆不變的標準，是其「觀點」、「結論」與「材料」三者之間的內在邏輯關係。如果我們根據題材和內容，將某個研究成果做「本土」和「西方」的分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從觀點、方法和結論上着眼去劃分，就顯得莫名其妙。那些個性化、

新穎獨到、不可取代的研究成果，本來就無所謂「本土」與「西方」的分野。換言之，只要我們的研究有充分事實依據，就不必刻意借助西方經典的裝飾來提高自己的身價，也不必刻意標新立異來顯示所謂「本土性」。

這裏涉及的問題，與其說是「小歷史」與「大歷史」、「本土」與「西方」的分野，不如說是「理論性」與「客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分野。我所理解的「理論性」，是建立在客觀材料基礎之上的對研究對象的一種獨立的、個性化的系統認知建構。與之相對，「客觀主義」的弊病在於僅僅滿足於羅列事實與材料，而缺乏必要的分析、歸納與詮釋，結果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教條主義」的弊病，則在於常常脫離具體的事實和材料，錯誤地將抽象的經典結論作為自己認知建構的柱石。

文中許多論者提到的關於中國近現代歷史「宏大敘事」的缺失，並不全在「宏大敘事」體例本身，而在於長期以來滲透於其中的那些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和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傾向。如果單就研究的範疇與敘述的體例而言，「新」與「舊」並無絕對的優劣高下之分，因為它們研究的範疇並不相同。因此，我們所能做到的，就是盡量克服主觀懸想與臆斷，忠實記錄我們所觀察到的一切，使觀點與結論完全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之上。從這個意義上講，「微觀實證研究」的大敵不一定

是「宏大敘事」，而很可能是「客觀主義」和「偽實證」主義。

董國強 南京
2003.5.9

只有建設強健民族國家， 才能超越國家民族

一個不致力於形成某種超國家民族認同的人類世界，肯定不會有希望。莫蘭在〈從歐洲命運共同體到全球命運共同體〉(2002年10月號)一文中，談到他對歐洲形成命運共同體的觀察與思考。歐洲確實是在對自身歷史的反思中超越了過去的那種對立循環的，兩次毀滅性世界大戰使近代歐洲的三個特性：世俗化、否定性和歐洲問題性(莫蘭的總結)，轉向了對自身歷史與未來的新思考；其成果就是1945年後，一個新歐洲出現在人類世界——這個歐洲意識到，歐洲人的命運是共同的，要防範民族絞殺主義(納粹主義)與極權主義東山再起，歐洲別無選擇，只有聯合起來，走向相互依存。

邁向更高程度的聯合，業已成為歐洲歷史進行到今天後不可改變的意志。這一過程當然意味着，傳統的民族國家絕對主權觀念及其實踐已經不再暢行於當下的歐洲社會。那麼，今天的歐洲是否如一些論者所想像的那樣，基於聯邦或邦聯的歐洲認同已經大於基於現代民主制度和主權原則的國家民族認同了呢？陳彥在介紹馬涅特(Paul Magnette)《歐洲、國家與民主》的文章〈歐洲悖論

與歐洲聯合〉裏(均見去年10月號)，提到馬涅特的觀察：「歐洲聯合進程啟動時期其實也是歐洲各民族國家加強時期」，「歐洲各國在打造歐洲共同體的同時，也加強了各自民族國家的分量」。馬涅特認為這乃是一個悖論，的確確，歐洲命運共同體及歐洲國家的彼此主權讓渡，程度也顯著提高了。

一種真正有力的國際主義的理想和信仰，只會建築在現代民族國家的高度成熟之上，否則沒有可能。過往人類生活中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普世主義情懷，沒能產生出「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世界主義社會，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試驗，也沒能結出超國家認同的豐碩之果，則從反面說明了悖論中的人類經歷。

當代中國可以從歐洲經驗中所得出的啟發不外是：在推進民主正當性的過程中強化國家民族認同，使中國真正成為現代成熟的民族國家；同時對東亞國家和國家組織如韓國、日本與東盟等，應樂見其成於它們獨立自主提升國家能力。在此前提下，一個漸漸相互讓渡主權的東亞才是可以想像的，一個走向一體化的東亞才是可以想像的，一個無戰爭威脅的東亞才是可以想像的。

程亞文 北京
2003.5.8

誰的諾貝爾獎情結？

讀了曹聰的〈中國科學界的諾貝爾獎情結〉(2002年12月號)一文後，我為作者在文中提出的諸多頗有見地的分析喝

彩。但是，我對該文題目的說法卻有點疑慮。諾貝爾獎情結究竟是誰的情結？至少對所謂「『中國科學界』的諾貝爾獎情結」不能苟同。文章自始至終談論和舉例的只是「自然科學」，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用「中國自然科學界的諾貝爾獎情結」為題才算合適。

在大陸，歷來有不把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當作科學的「光榮」傳統，所謂「臭文人」就專指從事後兩種科學教學與研究的人，因此就有了今天在大陸只有「科學院士」和「工程院士」的現象。更為明顯的另一個例證就是「科技官僚」當道。這些人可能在短期內能讓大陸呈現出繁榮的表象，但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政治利益，對從長遠來說對大陸最需要的政治改革、民主與法治建設卻採取能拖則拖的態度。但願「科技官僚」治國的局面由此能開始改變一下。

作者雖然在文中提到，但卻沒有展開的，就是北京對不同諾貝爾獎得主所持的截然相反的態度。北京一方面把華裔諾貝爾物理學獎和化學獎得主視為座上客；另一方面對僅有的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和文學獎得主卻大加撻伐，視為仇敵。從這種讓人難以理解和接受的反差來看，諾貝爾獎情結究竟是誰的情結？我認為，這既不是中國科學界的情結，也不是中國科學家的情結（「中國科學家對奪取諾貝爾獎沒有太多的衝動」——文章原文），而是政黨留名的情結和狹隘民族主義糾纏在一起的死結。

靈山 北京
2003.3.25